

北洋政府时期江西的金融风潮 及对农村金融的影响

■ 杨 勇

[内容提要] 北洋政府时期,江西金融业接连发生3次大的金融风潮,银行、钱庄、典当等一大批金融机构在风潮中关门倒闭,金融风潮引起纸币贬值、物价上涨、市面萧条、社会动荡等严重后果。江西金融风潮迭起有多重致因:北洋政府江西当局的黑金政治,战乱频仍、政局动荡乃至币值混乱等,金融业本身的投机性则推波助澜,政府对金融业干预失当也是引发金融风潮的导火线。

[关键词] 北洋政府时期;江西;金融风潮;农村金融

[中图分类号] F830.99 **[文献标识码]** A **[文章编号]** 1006-2335(2010)06-0161-03

[作者简介] 杨 勇(1977—),男,博士,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,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史。
(江西南昌 330013)

本文为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“百年江西农村金融市场变迁研究”(项目编号:08LS04)阶段性成果。

北洋政府时期,中国金融业迭生风潮,学界对此已有不少研究;此一时期江西的货币和金融变迁,学界也有一些成果,但未对江西历次金融风潮作全面考察。本文试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,详细梳理北洋政府时期江西三次金融风潮的发展脉络,分析金融风潮发生的政治经济环境和地方省情,以及金融风潮对农村金融的影响。

一、北洋时期江西几次金融风潮

(一)“取消九三八平市银”金融风潮

所谓的“九三八平市银”,是清末民初南昌、九江等地,钱庄、商店乃至银行之间交易结算的一种记账单位。因当时金融市场货币繁杂,为交易方便,买卖各方在进行大宗贸易时,通常采用“九三八平市银”这一虚银两单位来计算。“九三八平市银”凭条由钱庄开具并收付,实际支付时则折为银元。江西当局认为,银根紧缩、现洋缺乏、纸币贬值的根源在于市场

上的暗盘交易;进而认为,只要取消“九三八平市银”这一传统的虚银两计算单位,就能挽救九五官票贬值的颓势,维护和捍卫官票的信用。1914年秋,江西当局宣布执行北洋政府的“国币条例”政策,取消“九三八平市银”,改以银元为货币本位。

政府的政策受到民间的抵制。钱庄业为此而罢市近一个月之久,江西的社会经济深受影响。不少商家大宗交易,私下仍用“九三八平市银”过账往来。

(二)“官票”风潮

在取消“九三八平市银”的同时,江西当局拟定,银元和九五官票的兑换价格为1:1800。政府采取强制手段维护官票的信用,以期走出困境。1915年,财政部通令各省金库划归中国银行接管,办理收解业务。此令出台,致使江西民国银行失去金库收入这一主要资金来源,该行顿感资金不敷周转,只得将一些分行机构收缩或关闭歇业,最终加剧了江西民国银

行金融破产的危机。当年8月,江西省金库划归中国银行南昌分行接管,江西民国银行只能将益阳、津市、武穴、湖口等12个汇兑所,陆续停业收歇;同时将吴城、南城、樟树、玉山、瑞州5个分行改为分庄,不久也停止营业。1915年间,因滥发纸币,加以各行经理任用非人,致使银行亏损巨大。1916年初,上述各分行全部歇业。

官票风潮出现后,尽管江西民国银行“向中国银行息借四百万元以为收回纸币之用”,终因信用尽失,且回收纸币定价过低,江西民国银行不得不于1916年4月宣布停业清理。受此影响,江西劝业银行、江西储蓄银行在同年倒闭。官票泛滥贬值,银行歇业清理,引发了新一轮的金融风潮,造成物价飞涨、市民恐慌。之后,省政当局决定发行币制公债,继续回收官票,至1922年,江西民国银行的纸币仍未全部收回,“流散市场的官票之数约有银元票20余万元,九五制钱官票100余万串”。

(三)“江钞”风潮

1926年,直系军阀邓如琢主赣时,为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,邓指令江西地方银行将存款利息提高到3分左右,大量吸收钱庄商号存款,以补充资金。同时,邓如琢迫令江西地方银行发行毫无准备金的“复兴隆”钞票。市面上流通的“江钞”,初时尚有九折以上,以后则陆续下跌至八折、七折、六折、五折,直至跌到二三折。特别是邓如琢在溃逃之前,亲自派人监印“江钞”,大量发行毫无准备金的“复兴隆”钞票,逃离时还将票版携往上海加印。1926年11月8日,北伐军攻入南昌后,“江钞”市价已猛跌。因邓如琢逃走时带走“复兴隆”三字号的票板,蒋介石下令:复兴隆三字钞票完全作废,“旧钞准以二折流通,铜元票以五折流通”;此令一下,“市面竟无流通之可言。虽跌至一角七分,至一角三分,犹无人顾问”,江钞风潮因此爆发。

12月4日,数千人聚集在江西地方银行门口,将大门捣毁,把行长包竹峰的儿子抓了起来;6日,南昌市商店罢业,包竹峰住宅被捣毁。“江钞”风潮是近代江西最大的一场金融风波,经过“江钞”风潮,江西金融业遭受严重打击。江西地方银行宣告倒闭,全省“停业的银行钱庄共计63家”;南昌市的当铺因受“江钞”牵连,就此绝迹。风潮之后,“全赣汇兑,为之不通,货物来源,为之断绝,金融停滞,物价增高”。百姓手中的钞票瞬间变为废纸,生活陷入绝境,民间流传

“复兴隆,一夜穷”的民谣。

二、金融风潮成因分析

从政治经济发展环境来看,黑金政治是引发金融风潮的重要原因。北洋军阀(李纯、陈光远、蔡成勋、方本仁、邓如琢等先后出任都督)统治江西的14年(1913-1926)中,大量搜刮钱财中饱私囊。李纯在天津、北京投资建造的商品房有七八千间;陈光远离职后,即以多年聚敛的财富在天津经商;蔡成勋在江西窃得的现款就有1000万元,其中500万元汇回了天津老家,天津某街因上述江西都督在此大量购买地产,而被称为“江西街”。北洋军阀“圈钱”的主要方法之一,就是通过银行大量发行纸币。更可笑的是,邓如琢败走南昌时,居然不忘带走“复兴隆”三字号的票板,还做着通过发行钞票“圈钱”的美梦。

战乱频仍、政局动荡则是引发金融风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。民国时期江西战乱频临,1913的“二次革命”中,江西是主战场之一;1922、1924年,孙中山主持的两次北伐中,战火都从广东延烧到江西;1926年的北伐战争,作战范围遍及江西全省。战争的频仍意味着地方军政费用的飙升。军费一项,有时占全年财政收入的80-90%,有时全年财政收入,“供给军费一项,商尚不敷甚巨”。1912年,江西省岁入512万两,支出却高达1042万两,收支相抵,财政赤字为530万两。政府的财政亏空,全靠向银行借债,通过银行发行纸币和公债弥补,江西民国银行、江西银行、赣省银行和江西地方银行,这些北洋政府时期江西影响最大的地方性质银行,均属官商合办或官办性质,最终都沦为地方政府的造币机器。到1926年,江西财政负债高达3400万元,其中银行垫借2000余万元,发行公债等1400余万元。银行滥发纸币,实为政府筹措军政费用。“官票”风潮和“江钞”风潮,皆因此而起,最终一发不可收拾。

金融业本身的投机性则是引发金融风潮的另一个根本原因。以“江钞”风潮中的民间金融资本为例。历经“取消九三八平市银”和“官票”两次风潮的袭扰,对于市场风险,民间金融资本本应汲取教训,慎重投资。对于江西省政府到期未能兑清历次公债的事实,以及1924年以来江西地方银行滥发纸币的情况,民间金融业也应有所风闻和了解。对于北伐战争,以及政权更迭导致纸币贬值加剧的可能性,民间金融业也是非常清楚。但是,当江西地方银行抛出“三分以上之高利,大量吸收存款”的诱饵时,民间资

本全然不顾及投资风险,一头栽入:“南昌市钱庄六七十家,尽入彀中,合计存入约千万元以上;且沪汉各地钱庄之与江西有关系者,均望风投附;民间之零星存户,亦复不少”。民间资本的投机与短视,对即将爆发的“江钞”风潮可谓推波助澜,最终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

政府对金融业干预失当有时也是引发金融风潮的导火线。此点在“取消九三八平市银”风潮中表现最为明显。作为大宗贸易和金融机构间的一种记账单位,“九三八平市银”在南昌行之已久,犹如上海之九八规元、汉口之洋例银,在币制混乱的时代,自有它存在的合理性。当然,钱庄和商家利用兑换差价赚取“贴水”,属于市场陋规;在金融市场混乱之时,钱庄和商家常做暗盘,私下交易,也破坏了正常的金融秩序。两者均需要加以整顿。但是,当时金融市场秩序混乱和纸币贬值的根源,在于政府财政收支严重失衡和银行滥发纸币。北洋政府江西当局漠“本”而治“标”,避重而就轻,对于民间金融业,不是加以整顿而是完全取消其“九三八平市银”这一传统的虚银两计算单位,其结果当然会遭到钱庄业的抵制,并最终加剧“官票”风潮的爆发。

三、金融风潮对江西农村金融的影响

持续的金融风潮,对江西农村金融体系产生了二个重大影响。

一是导致乡村金融机构的极度萎缩,民间借贷无门。除了江西民国银行收缩原有的各地网点外,传统的金融机构(钱庄、典当)更是因一系列的金融风潮大量倒闭。大量钱庄而参与“江钞”事件导致亏损甚至倒闭。1913年,江西各县几乎都有钱庄,全省钱庄数量达285家,到南京政府建立初的金融调查时,仅剩下201家,减少84家。典当业受到的冲击更大。据金陵大学农学院调查,1930年代初,江西仅剩九江惠农典、樟树惠黎公典、临川永兴典和寿和典和一些代当,与民初县县有典当落差千里。由于货币体系的混乱,江西的典当业在20年代曾经大量发行“发票”,最终导致其信誉败坏而破产。原有的正规当铺倒闭后,取而代之兴起的是大量商店兼营的小押店,这些小押店估价低、利息高,满当期限短,导致贫民百姓怨气很大。作为贫民和小农的“唯一金融周转机关”的典当业的严重衰落,使得普通百姓又丧失了一条非常重要的传统应急性融资渠道。

二是导致纸币信用急剧下降,市场上通货紧张。

铜元需求量多供应减少,纸币又发生信用危机,导致市面上银根紧张,造成了当时普遍存在的钱荒。以至于“社会上之找零,乃大感困难,有以铜元几枚之记条,盖章找零者,有将元票撕为数枚找零者。黄包车夫有时二人合得元票一张,因无钱可找,乃合购香烟一包,共同消费;乞丐亦以无铜元之故,终日沿门托钵,亦不名一文”,可见当时的钱荒到了何种程度。在这种情况下,各地花票(主要为铜元票、钱票)纷纷出笼。根据30年代江西省财政厅调查,江西各地发行花票数额较大的县共有30县,合计发行银元票180,750元,铜元票204,586,600枚,以每串铜元票换大洋三角计算,合银元613,759元,元票、铜元票合计达794,509元,1933年江西三家地方银行(江西裕民银行、建设银行、南昌市立银行)发行的辅币券流通范围仅见于南昌、九江、吉安几城镇,绝大多数县没有普及。而各县私自印发的铜元票和代币券之类的花票,价值近80万元之多,不下于三家地方银行的发行总额,甚至连“卖浆理发之店,俱出花票”。

这些花票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钱荒的结果,反过来更导致货币体系的混乱,使得地方银行纸币信用全失,对后来的币制改革造成很大的阻力。

〔参考文献〕

- [1]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.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[A](第3辑). 南京:江苏古籍出版社,1991.
- [2]周葆蓁. 中华银行史[M]. 台北:文海出版社,1973.
- [3]江西省政府经济委员会. 江西之金融[M]. 1933.
- [4]江西省政府统计室编、刘治乾. 江西年鉴[Z]. 1936.
- [5]诸锦藻. 江西近代货币简史[M]. 南昌:江西人民出版社,2001.
- [6]张静庐. 革命后之江西财政[M]. 南昌:光华书局,1927.
- [7]李辉. 南昌市金融志[M]. 南昌:江西人民出版社,1991.
- [8]江西省省志编辑室. 江西近现代人物传稿(第1、2辑)[M]. 海口:海南人民出版社,1989.
- [9]江西财政厅. 江西财政纪要[M]. 1930.
- [10]华桐. 江西省志·财政志[Z]. 南昌:江西人民出版社,1999.
- [11]李德钊. 十年来之江西金融(16). 赣政十年[M]. 1941.
- [12]杨勇. 近代江西农村金融体系的制度变迁.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[J]. 2009, (5).
- [13]姚肖廉. 江西钱荒问题之研讨. 银行周报[J]. 第20卷第48期, 1936-12-8.
- [14]江西省政府经济委员会. 江西经济问题[A]. 台北:学生书局,1971.
- [15]江西省政府经济委员会. 赣政十年[A]. 南昌:1941.

〔责任编辑:王建平〕